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是中华民族的自然观、文明观和存在方式，它渗透在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主要经典之中。“万物并育”出自于《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它体现着中国人宽广的胸怀、深厚的仁德和卓越的智慧，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在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文明观

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旨在揭示包括整个宇宙在内的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深刻贯通性。其中的“天”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之天”,即人类所身处的广袤宇宙和生生不息的自然界;二是“义理之天”,即宇宙自然的最高原理和根本规律。相应地,“天人合一”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人类始终是宇宙自然的一个部分,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天地和人由同样的元素构成,并通过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类不能脱离这一有机整体而独存;二是宇宙自然的总体法则和人类活动所应遵循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这一法则便是“生生之仁”,天地以生生之道化育万物、运转不息,人类应当基于生生仁德创造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性经典，其中将天、地、人并列称为“三才”，认为最具仁德和智慧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希望人类能够“则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发现并把握天地运行的根本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造福人类、造福天地。《周易》也常常要求人类通过向天地学习来提升自己的德性和人格，我们所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人类应当学习天地健动不息、含弘光大的精神来培养自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周易·贲》提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 李 毅

万物并育的深厚仁德和卓越智慧

《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既是在描述宇宙界、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也是在表述人类活动应当达成的一种理想、一种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万物并育”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和最终实现。自然界虽然存在着高级生物食用低级生物的食物链，但总体上各个物种都能够有自身的生存领地和发展空间，从而实现自身种群的生生不息和整个自然界的多姿多彩。人类在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发展自身文明的时候，应当尽力避免对于其他物种生存空间的过度侵犯，避免对于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颠覆性破坏。这不仅是一种“泛爱万物”的广博而深厚的仁德，而且是一种从总体上统筹人与万物的生存发展，从而实现和谐共生的卓越智慧。

中华民族是仁德深厚的民族。自从孔子将“仁”确立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原则，中华文化便成为世界上最具仁爱精神的文明之一。孔子不仅提倡“仁爱者”，而且“约而不纲，弋不射宿”，在捕鱼的时候提倡采取“约”的方式，拒绝采取一网打尽的方式，在捕鸟的时候绝不射杀归巢栖息的鸟。孟子将孔子这种精神总结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并将孔子“约而不纲”发展为“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也提出“万物各得其时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命题，希望万物各得其所。道家的代

袁人物庄子希望天地万物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本性，实现各自的“逍遥”。汉唐的学者倡导人们“德及禽兽”“恩及鳞虫”乃至“德至深泉”“恩及于金石”。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认为草木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是贯通的。朱熹提出“万紫千红总是春”“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气”。王阳明在著名的《大学问》中详细列举了仁者对于他人苦难的同情、对于鸟兽哀鸣的不忍、对于草木摧折的怜悯、对于瓦石毁坏的顾惜，提倡“一体之仁”。

中华民族也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实现自己的仁德。为了能够实行“万物并育”，华夏先民制定了详细的法令来防止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掠夺。《礼记·月令》中规定，初春的时候，祭祀不能用牲畜做祭品，不准捣毁鸟巢，禁止杀害各种幼虫、幼鸟、幼兽。《秦律》中规定，春天的时候禁止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罗，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夏天之前，禁止用渔网捕鱼。汉宣帝曾下令京师一带禁止在春夏间倾覆鸟巢食用鸟卵，禁止弹射飞鸟。我国古代也早就采取“休耕”的方式保护土地，甚至还注意到部分土地留荒不耕，以便维持整体生态的平衡。为了保证这些法令的实施，先民还设置了相关的官职。《尚书·舜典》中记载了一种名为“虞”的官职，担任这一官职的人需要掌握山林的大小及其物产，顺从草木鸟兽的特点来进行管理。《周礼》中“虞”的官职进一步细化，出现了“山虞”“林衡”的具体分工，分别管理山脉和林木。《周礼》还记载有“庖人”一职，负责管理各种金属矿产资源。古

代也有管理水域的官职，管理湖泊的官吏叫“泽虞”，管理河流的叫“川衡”。我国古代还设置“土均”“土训”等管理土地的官职，帮助人民更好地辨别不同的土地，以便各尽其用。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 塑造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及其指导下的生态实践，有效地避免了生态灾难在神州大地上的发生，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文明不是空中楼阁，需要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展开。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文明发生的基本条件，优越环境的持续保持，则是文明延续的首要前提。如果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再辉煌的文明也会因为失去家园而迅速消亡。与中华文明并列为全球四大文明的古巴比伦文明，其消失的一大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华文明则因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指导下的仁爱精神和缜密的生态保护措施，得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而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中所蕴含的效法自然、自强不息精神，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形成。文明无法在守旧中获得延续，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获得延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并不是静态的合一和并育，而是动态的生生不息，其中倡导人类取法天地、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日新其德，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源头。而为了真正实现万物并育，中华民族不断探索自然规律，创新方式方法，创造出如都江堰、红旗渠这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工程，为全人类

的生态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蕴含的整体意识和对个体的尊重，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形成。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都需要不仅从个体的、局部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善于从整体上、从大局上考虑问题，否则共同体便容易走向解体；任何一个共同体，也必须同时保障其中每一个个体的正当权益，否则也会造成共同体的分裂。“天人合一”体现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万物并育”则包含每一个中华儿女正当权益的实现，二者一起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保证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历史大势。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蕴含的一体意识和无私精神，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形成。世界上的文明非止一家，每一种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都应当得到肯定。“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正是要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肯定万事万物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天人合一”所蕴含的一体意识使得中华文明真诚地关心所有文明形态的发展和繁荣，“万物并育”所蕴含的无私精神又使得中华文明真诚地主张各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尤其是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蕴含的深厚中华和卓越智慧，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突出和平性的形成。和平性是世界人民的永恒期望，但如果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缺乏仁爱精神以及和睦共处的智慧，和平便会岌岌可危。“天人合一”使得中华文明以生仁德为自己的根本原则，“万物并育”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卓越智慧，从而真正能够促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大同世界”的最终实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辞书之祖《尔雅》

□ 胡亚军 陈文平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孝经类”，汉文帝时期，《尔雅》与《论语》《孝经》《孟子》一起被设置为博士职，唐代以后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尔雅》书名中“尔”亦作“迩”，是近的意思，“雅”的本义是“正”，引申为雅言，即官方的规范化语言，“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即以雅正之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

“百科词典”

《尔雅》共二十篇，现存十九篇，收录词语 4300 个，条目 2091 个，汇集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方言古语和名词物类等词汇，类似于今天的百科词典，是我国首部按照词义分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根据训释词语类别分为五类：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属语言类，专门训释字义词义，训释常用词语条目 623 条，词语 2000 多个，词的总数约占全书一半。例如《释诂》第一条训释了同为“开始”义的十个词语：“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内涵即不完全相同，“初”从衣从刀，是裁衣之始，“首”是人体之始，“祖”是人类之始，“权舆”是草木迂曲出土，是植物生长之始，既展现了《尔雅》记载词语的完备，也体现了编者的周全与细致；再比如，我们有个熟悉的成语 斤斤计较

“斤”，用来形容对微小的利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过分计较。“斤斤”这个词在别的地方很少单用。《释诂》专门训释“明明，斤斤，察也”，是描写事物情貌的叠音词或联绵词，明是心里清楚，斤是看得仔细，说明观察很细致，这就告诉我们“斤斤”明察秋毫、心内了然是好事，但是过分计较就容易内心起冲突。中国汉字所蕴含的智慧与情志在《尔雅》训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值得细细品鉴。第二大类属人文关系类：《释亲》，从这篇开始训释的词类几乎全是名词词性，训释主要针对宗族、母族、妻族、姻亲四类亲属关系的称谓展开训释，如训释宗族记载“父为考，母为妣”，训释母族记载“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训释妻族记载“妻之姊妹同出为姨，女子谓姊妹之夫为私”，训释姻亲关系记载“女子子之夫为婿”。

第三大类属建筑、器物类，《释宫》训释房子、建筑；《释器》训释人制作的器皿工具，比如通过辨析制作材料的不同，训释“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筩，瓦豆谓之登”；《释乐》训释乐器，这些都是人类制造的东西。第四大类属天文地理类，《释天》《释地》《释山》《释水》，如“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汭”，

读”，释明了水流的不同形式及其称谓，此外还有对“天地山丘”自然地理常识的观察认知。第五大类属植物动物类，《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按照事物性质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大量动植物知识，是古人对“草木虫鱼鸟兽畜”等自然万物的观察总结，构成了一份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博物文库”。

“博物不惑”

《汉石·艺文志》称：“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尔雅》作为一部注解五经等古代文献典籍词语的辞书，不像一般的经书那样是供阅读的，它主要是用当时的标准语训释了先秦古籍中许多易产生歧义的古今古义、方言俗语、难僻词语等，因此成为儒生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研究，学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说经之家，多资《尔雅》以证古，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既解释了《尔雅》列入经书的缘由，也证实了其在经史学家心中的古代经典文献地位。《尔雅》在南北朝时期被尊

称“诗书之襟带”，宋朝时期被赞誉为“六籍之户牖，学术者要津”，到了清代，《尔雅》被尊崇为“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航”，强调了《尔雅》的规范性工具书性质。

自汉代以来,《尔雅》备受推崇,古人甚至认为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惑”。东汉光武帝在灵台宴百官席间有人献上一只豹纹毛皮的花鼠,光武帝询问百官是何物,群臣皆不知,窦攸说是鼯鼠,问其依据,窦攸回答“见《尔雅》”,光武帝命人翻阅验证,果然如窦攸所言,当即赏绢百匹,令公卿子弟跟随窦攸学习《尔雅》。到了汉朝,《尔雅》已经与《论语》《孝经》并列,成为儿童完成识字蒙学之后的必读书目。

《尔雅》是为训释经书所作，收集了大量的古代训诂资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文献资料，阅读古代经典著作，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它的训解内容涉及先秦时期的文字和名物，因此在文学、文化学、语言学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研究古代词义和古代名词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春秋三传之《公羊传·襄公·五年》记载：“叔孙豹则属为率而与之俱，盖舅出也”，关于这个“出”字意义不明，《释彖》训释

为“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出”即现代汉语里外甥的意思，在当时，“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鲁国之外的诸侯国之间相互往来原本应该是不记载的，这就解释通了叔孙豹带都国太子巫到访晋国的原因，原来他们之间是亲戚关系。

“雅学之始”

《尔雅》成书较早，且文字古朴晦涩，随着时间流逝记载不足，不少词义在汉代时几乎已经很少有人能懂。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理解《尔雅》，开始有学者为《尔雅》作训诂注解，如汉代刘歆、樊光、李巡及三国时期魏代刘焯等，但是这些作品多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尔雅》注本是晋朝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编撰的《尔雅注疏》，他借鉴樊光、李巡等前人旧注，“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采集歌谣俗语，为《尔雅》重新作了注释。郭璞擅长采用举例论证的办法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汉语被后人理解，例如，《释木》训释“櫜，羊枣”。郭璞注：“实小而圆，紫黑色，今俗呼之为羊矢枣。”《孟子》

